

楚辭

論

稿

朱碧蓮·著

上海三聯書店

(沪)新登字 117 号

责任编辑 赵立新

封面设计 邹继华

楚 辞 论 稿

朱碧莲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1 字数 224000

印数: 1-2000

ISBN 7-5426-0574-7/I.87

定价: 9.80 元

自序

楚辞为我与外子沈剑英的共同爱好，唯切磋时日无几，他即罹于阳九，从此与楚辞分手，我亦难免虚掷光阴，蹉跎岁月，发表第一篇有关楚辞的论文已在20余年之后，正是“老冉冉其将至”之时，如孔子所云：“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这里所载的文字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个人以衰秃之笔勉力为之的一得之愚，深望能得到方家同好的指正。

书中最后5篇文字，即《〈离骚〉之“西海”与西方乐土》、《〈九歌〉为旱祭之乐歌考》、《“东君”之神格考》、《〈天问〉新释》、《〈楚辞〉札记》，系小儿沈海波学步之作，一并收入，以乞玉斧。

拙著承前辈学者苏渊雷教授题写书名，在出版过程中，更得到上海三联书店的大力支持，谨此志谢！

朱碧莲

1991年暑日于沪上还芝斋

目 录

论屈原之思想及其渊源	1
论屈原的修养观	25
不有屈原 岂见《离骚》	
——与日本学者冈村繁教授商榷	44
论《离骚》中窜入的文字问题	60
《离骚》太阳神说质疑	75
“离骚”是“离别蒲骚”吗	102
论《离骚》中的女嬃与“子兰”	111
《离骚》三求女解	123
为“计极”进一解	134
伍子胥·介之推·申徒狄	
——兼论《惜往日》《悲回风》之真伪	137
梁启超论屈原	163
略论王国维研究屈原之贡献	172

论宋玉及其《九辩》	179
宋玉辞赋真伪辨	194
唐勒残简作者考	210
楚辞旧注管窥	224
《离骚》之“西海”与西方乐土	246
《九歌》为旱祭之乐歌考	252
“东君”之神格考	269
《天问》新释	274
《楚辞》札记	286

论屈原之思想及其渊源

屈原存世之作都是纯文学作品，但其中表现了强烈的思想倾向，足以反映其思想归属。他生活在战国后期百家争鸣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思想流派的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归纳先秦主要的思想流派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这是概括得当的。屈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也不出这六家的范围。从其政治理想和道德修养来看，尤其突出地表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点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论说甚详。有人或许以为把屈原的思想说成主要受某一家的影响就是贬低了屈原，认为他是融汇百家之长而自成一家之说，好像这样才是尊重屈原。评论屈原思想的根据只能是他的作品，从他的作品出发，对照孔孟著作，本文认为屈原接受了孔孟的先王观，主张仁政，强调修身，在某些问题上突破了孔孟之说，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又有比孔孟保守的地方。



战国时期，要求从分裂走向统一，结束诸侯纷争的局面，

实现大一统，几乎是当时诸子的一致愿望，只是在怎样实现统一的问题上，各家主张不尽相同而已。儒家学派的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进而提出效法先王推行仁政的主张。所谓“先王”，就是尧、舜、禹、汤、周等圣君。孔孟都是“言必称尧舜”，而这在屈原的诗作中也是十分引人瞩目的。试予对照：

《论语·泰伯》：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孟子·离娄上》：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国君好仁，天下无敌。

屈原在诗作中，如此反复多次称道尧舜三代之君，既体现了胸怀统一中国之大志，亦说明他要实行儒家的仁政主张。他在正面标举效法先王的同时，提出桀纣荒淫失国以为前车之鉴，以强烈的对比表达热烈的爱憎。而儒家也正是以桀纣之淫昏与三代之至治作为对照来倡导仁政的。如：

《尚书·召诰》：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

《九章·哀郢》：

彼尧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

《离骚》：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九章·抽思》：

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

《离骚》：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

在。

《离骚》：

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

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

曰，不其延，惟不敬其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其德，乃早坠厥命。

《尚书·多方》：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诞厥逸，不肯威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

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天问》：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

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

屈原不仅崇奉尧舜等先王，鞭挞桀纣等昏君，对为孔孟所敬仰的比干、伯夷等贤人也引以为榜样，心向往之。（如《九章·橘颂》：“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九章·悲回风》：“求介子之所存兮，见伯夷之放迹。”《天问》：“比干何逆，而抑沉之？”）

由于尧舜是诗人心目中的圣君和偶像，故当有人对他们有微词时，诗人就予以痛斥。《九章·哀郢》曰：“尧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伪名。”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指出这是批判庄子对尧舜的污蔑，实为肯綮之论。《庄子·盗跖》有“尧不慈，舜不孝”、“尧杀长子，舜流母弟”之说，与孟子针锋相对。孟子谓“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并为其辩白曰：“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舜尽事亲之道，此之为大孝。”^①庄子不仅骂尧舜，还嗤笑伯夷、比干等忠臣“无异于彘犬流豕操瓢而乞者”，以为他们忠谏而死的行为“卒为天下笑”。屈原对庄子之说显然不满，故在《哀郢》中借揭露朝中奸佞播弄是非之便举尧舜受攻击为例，说明德配上天圣人尧舜尚且有人横加恶名，何况自己受小人的陷害，更是

① 见《孟子·离娄上》。

不足为奇了。

实行仁政的关键在于任用贤德之士，贬斥谗佞小人。儒家有关论述不少。如《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当仲弓当了季氏家臣向孔子问政时，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①《说苑·尊贤》载齐景公与孔子间的问答曰：

齐景公问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国小，处僻而霸，何也？”对曰：“其国小而志大，虽处僻，而其政中，其举果，其谋和，其令不偷，亲举五羖大夫于系纆之中，与之语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霸则小矣。”

说明孔子将国家能否大治与是否举贤授能联系在一起。孟子对此亦十分强调，谓“惟仁者能在高位”②。“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③。“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④。“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百里奚举于市”⑤。儒家著作《礼记》亦谓：“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聚众而誓之。”⑥再看屈原，他在诗作中也是一再称颂三代先王有道，举贤授能，君圣臣贤，故天下大治。《离骚》有曰：

汤禹严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① 见《论语·子路》。

② 见《孟子·离娄上》。

③ 见《孟子·公孙丑上》。

④ 见《孟子·万章上》。《论语·颜渊》载子夏言：“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

⑤ 见《孟子·告子下》。

⑥ 见《礼记正义·礼器》。

汤禹严而求合兮，桀咎陶而能调。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诗人笔下的这些明君贤臣都是儒家典籍所称道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国君在寒微中识拔人才，任用不疑；臣子能竭尽才智辅助国君，成就德政，这也就是诗人梦寐以求的“美政”。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诗人是命运不济：“哀朕时之不当。”下有“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上则“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重华不可遇兮，孰知余之从容”、“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也”、“伯乐既没，骥焉程兮”。现实如此，诗人只能在诗篇中热烈歌颂三代的圣君明主，以寄托内心的向往，对“壅君”谗臣表示强烈的不满。

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儒家典籍是比较重视的。《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孔子所说的“仁”也包含了对人的重视。《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载孔子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当哀公问怎样的人算作贤人时，孔子谓：

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

中矩规，而不伤于本。①

孔子把是否重视人民作为评价从政者是否为贤人的标准。又如《论语·乡党》曰：“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郑玄谓孔子是“重人贱畜也。”说得很对。可是孔子这段话，在“评法批儒”时，却被认为是“伤人乎不？问马”。将“不”字作为疑问词“否”字，似乎孔子是重马而轻人的。不必说如此标点违背了

① 见《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

古汉语的规律，就算是对的，也丝毫说明不了孔子是重马轻人的，因为他首先问的是人伤着没有，第二位才问到了马，这难道不正是重人而贱畜吗？孟子也说到孔子重人的问题。《梁惠王上》云：“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则进而加以发挥，看到民心向背对国家兴亡的决定性作用：“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这些话相当精辟地概括了他重视人民的认识。他还举例说明历史的教训：“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③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全信，他们未必做得到真正的爱人，但他们至少清醒地认识到民心的向背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所以才如此重视。

屈原在作品中虽然没有以很多的篇幅来描绘人民的生活面貌，但还是表现了对人民的关心与爱护。《离骚》有句曰：“长太息以流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九章·哀郢》曰：“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怒！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九章·抽思》：“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这些令人震撼的诗句表明了诗人就是人民的一员，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故对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人民在诗人的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

仁政主张的思想基础是“性善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④概括了先王观和性善说之间的紧密联系。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善良的本性，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

① 见《孟子·公孙丑下》。

② 见《孟子·尽心下》。

③ 见《孟子·离娄上》。

④ 见《孟子·告子上》。

我也，我固有之也”^①。那么人之善性是否永远不变呢？不然，仍需不断培养才能保持，故孟子要求人应常常反省检讨，就是“反求诸己”、“求其放心”^②，如此才能“不失其赤子之心”^③。因为要保持人之善性，所以儒家提倡修养，强调个人道德的完善，这方面的名言不少。如《尚书·太中》：“修厥身。”《周易·文言》：“君子以进德修业。”《论语·述而》：“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孔子曰：君子修身返道察说。”

屈原在自我修养方面是十分突出的，他以此保持自己天生的“内美”，用以抵御外力的引诱。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余论卷上》指出《离骚》突出一个“修”字，曰：“篇中曰好修，曰修能，曰前修，曰修初服，曰信修，修字凡十一见，首尾呼应，眉目了然，绝非牵强之见。”《离骚》中的“修”字意义不一，不一定都作修养解，但用得如此之多，并非偶然。有关道德品质修养的诗句，如：

《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九章·抽思》：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

《九章·怀沙》：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

《九章·思美人》：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

《橘颂》：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

诗人就是依靠自我修养排除外来干扰以保持美德的。也有相反的情况，即“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

①③ 见《孟子·告子上》。

② 见《孟子·公孙丑上》。

兮，莫好修之害也”^①。“憎愠怵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②。那些曾由他花费心血浇灌的芳草因为不肯修身而失去原有的美质，与萧艾等恶草同流合污。楚王则不辨美丑，宠信谗佞，排斥好修之贤士，如此昏君焉得不亡！有美德者才能称为贤者，才能实行美政，故屈原再三强调个人的自我修养，这与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③的意思是相同的。国君不德，自然是是非不分，亲小人远贤臣，如此则焉能以德治天下！

与自我道德修养相关的，是对待过错的态度。孔子以为人难免犯错误，只要能改正就好。其名言如：《论语·学而》：“过则不惮改。”《里仁》：“观过斯知仁矣。”《卫灵公》：“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子张》载子贡语：“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韩诗外传》卷三：“孔子曰：昔桀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王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过而改之，是不过也。”能否改过，不仅是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对于国君来说，更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成汤、文王与桀纣就是具体的例子。在这个问题上，诗人恰也是爱憎分明的，他是多么希望楚王能够幡然悔悟，改弦更张，摆脱谗佞的包围，重新振作起来！

《离骚》：“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

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

兮，后悔遁而有他。

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① 见《离骚》。

② 见《九章·哀郢》。

③ 见《论语·子路》。

《天问》：悟过改更，我又何言？

《抽思》：兹历情以陈辞兮，荪佯幸而不闻。

初吾所陈之耿著兮，岂至今其庸亡。何独乐斯之
眷眷兮，愿荪美之可完。

骄吾以其美好兮，傲朕词而不听。

《惜往日》：弗省察而按实兮，使谗谀而日得。

这些诗句表明诗人忠心耿耿，反复陈词，希望国君醒悟过来，保持美德。但事实却相反，国君出尔反尔，拒谏饰非，毫无反悔之意，辜负了诗人的苦心，令人痛心！《天问》结尾的“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句，正面赞扬楚昭王能够悔悟改过，使濒于灭亡的楚国得以复兴。诗人以这段历史作为现实的镜子，希望楚王有所触悟，然而这只是一个梦想，终于被昏庸的楚王击得粉碎！

此外，孔子一些处世立身的名言，在屈原的作品中也有或多或少的反映，如《论语·学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九章·涉江》：“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如此等等，都隐约使人体体会到诗人在道德修养上与儒家一致，这是不能忽视的。

二

屈原是爱楚国、爱人民也爱楚王的，他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固然，他对楚王的不辨忠奸是异常不满的，甚至咒骂楚王的昏庸不明，表现出明显的怨恨情绪，但对楚王还是忠心耿耿的，因此这是从忠君思想出发的怨恨。他曾反复表明自己对楚王的忠贞不贰：“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所作

忠而言之兮，指九天以为正”，“思君其莫我忠”，“事君而不贰”。他所敬仰的忠臣，有彭咸、伍子胥、伯夷、比干、介子推等人，其中第一位是彭咸，在《离骚》和《九章》各篇中曾7次提到他；第二位是伍子胥，《九章》中3次提及。他们共同点一是忠于国君，二是被谗致死，其中比干和伯夷都是殷纣王时人，他们都是贵族出身，是殷纣王的忠臣，比干直谏而死，伯夷不食周粟，至于彭咸其人，王逸注曰：“殷贤大夫也，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屈原最敬仰彭咸，反复表示要效法他，最后的自投汨罗也与彭咸“自投水而死”相仿佛，这些人中，比干和伯夷都是孔子、孟子所颂扬的“仁者”、“贤人”，所以在忠君这一点上屈原是深受孔孟，特别是孔子的影响的。

孔子是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当鲁定公问他“君使臣、臣使君如之何”时，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①屈原正是“竭忠诚以事君”^②的。孔子赞扬比干、伯夷，实际上在提倡不管君使臣是否有礼，臣事君都得忠。殷纣王是公认的暴君，可是伯夷却宁肯饿死亦不食周粟，屈原表示“行比伯夷，置以为像”，这正说明屈原在忠君这个问题上是孔子的信徒，甚至比之孔子还要走得远些。孔子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有时并不拘泥于忠君，而是看其对国家的统一是否有利。如对于管仲，子路与子贡都对孔子说，管仲和召忽共同侍奉公子纠，后公子纠为齐桓公所杀，召忽以身殉公子纠，而管仲非但没有同死，还转而侍奉仇人桓公，所以不能算作仁者。孔子答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

① 见《论语·八佾》。

② 见《九章·惜诵》。

而莫之知也！”^①孔子称赞管仲，是因为他辅佐桓公成就霸业，使天下安定，是有功之人。

至于孟子，在君臣关系的问题上似比孔子更为开明，第一，他主张臣子对国君的态度应由国君如何对待臣子来决定。《孟子·离娄下》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第二，孟子认为国君有了过失臣子就应该进谏。当齐宣王向孟子问及做大臣的道理时，孟子说有“贵戚之卿”和“异姓之卿”的区别。所谓“贵戚之卿”是“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异姓之卿”是“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这番话说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这表明孟子的君臣观念：臣子对国君不应盲从，当国君有过失时便要进谏，如国君坚持不改，轻则自己去国，重则将国君“易位”。所以他赞成“汤放桀，武王伐纣”。第三，对那些不为国君所用而出走他国，有所作为的人，孟子认为是“智者”，应予肯定。虞国的国君贪图晋国的珍宝而答应晋国假道伐虢，宫之奇力谏，而百里奚却并不进谏，因为他“知虞公之不可谏”，所以便跑到秦国去辅佐穆公，“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国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以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②孟子的肯定百里奚是用对国家强盛是否有利，而不是以忠于国君为标准来衡量的。

孟子的这些主张，屈原似并不完全接受，他对楚王是尽了进谏之责的。当楚王听信谗言而疏远他时，他也表现了怨恨和愤怒，把这种情绪反映在诗篇里，但仅止于此，并无“去国”、“易位”之举。到了最后一切绝望时，他是走了彭咸自沉的道路。

① 见《论语·宪问》。

② 见《孟子·万章上》。

正如司马迁所说：“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①以屈原的出身和所处的地位，他当然是把君与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爱国与爱君对他来说是统一的，但他明知“哲王之不寤”，楚王是昏庸糊涂的“壅君”，国事已不可为而还要“系心怀王”就未免太过分了，已到了愚忠的程度了。他最后以一死殉君国，确如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所说是“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不忘臣子之义尽矣。”楚王尽管没有尽到为君之责，而屈原却作到了为臣之忠。

在是否去国远游这个问题上，屈原也曾有过思想斗争。《离骚》中就曾通过灵氛之口说出了内心的这种活动。当他准备听从灵氛的劝告，升上天空时，“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留恋故国的感情战胜了去国远游的意志，他终于没有离开楚国。但屈原对那些不为本国所容在他方建立功业的人却并无异议，也同样表示了仰慕之情：“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②百里奚、宁戚和伍子胥都是在他国建立功业者。百里奚是虞人而仕于秦，宁戚是卫人而仕于齐，伍子胥是楚人而仕于吴，其中最特别的是伍子胥。他因不为楚平王所容而出奔吴国，辅佐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③，使吴国成为当时的强国。他对吴王可说是忠心耿耿，始终坚持灭越的政策，而吴王却听信谗言，不仅不

① 见《史记·屈原列传》。

② 见《九章·惜往日》。

③ 见《史记·伍子胥列传》。